

支庭荣

误传： 一个传播研究的反向视角

传播的意义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影响”说，强调传播是传者欲对受者（通过劝服）施加影响的行为；另一种是“共享”说，强调传播是传者与受者对信息的分享。误传（miscommunication，直译为劣质通信，不能清晰地通信）实际上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从传者的角度看，传播策划（communication planning）与传播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比如虚假广告因违反了有关法律制度，往往容易造成传播的失败，这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另一类是传者与受者之间不能有效地信息共享。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误传现象是很难避免的，它可以由于听者的原因或说话人的原因，可以是说话人错误地表述，或者有意误导，或不称职等，或其他因素。它也可以发生在传播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一般说来误传离不开特定的情境（context），但是也可以根据一套特别的标准来描述它。在某种意义上误传提供了一个传播研究的反向视角。

美国学者爱森伯格（E. M. Eisenberg）和菲利普斯（S. K. Phillips）（1991）从 4 个方面来对误传作出评估（见下表），它们反映了本世纪初以来在行为主义刺激下产生的大众传播学与西方现当代社会科学背景之间的独特联系。

特征取向	关键	有效性的标准	误传的特征
结构主义	机器管道效能	明晰理解	理解失败 超载 歪曲 模棱两可
实用主义	个人目标成本/收益分析	目标完成	目标完成失败

人际关系	开放性 揭示 共享 真实性	传播的 开放性 坦率	开放失败 不诚实 保密 缺乏全部暴露
批判理论	对话 共建 实践 能动性	开放对话 个人解放	对话失败 霸权 压制

机器比喻：误传视作理解失败

在结构主义式的机器比喻中，有效性被定义为效能，受者被看成是可更替的、被动的机器零件，因而传播就意味着信息的直接传递。一个传者当他或她将头脑里的东西以很少的“溢出”移送给受者时就是传播得很好。

与机器比喻相类似的是管道比喻。据此，成功的传播应当是清晰的、促进理解的，而且要传递必需的信息以使“机器”最理想地持续操作。当没有讯息被收到（例如，由于物理的或心理的噪音使人分心）或者讯息虽然收到但没有被用说话人（speaker）所打算的那种方式理解时，误传就发生了。清晰等同于语言能力，而模棱两可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典型的传播“崩溃”就是讯息超载、歪曲和模棱两可。在讯息超载方面，一个接收者被输入的东西所淹没因而无法理解说话人的全部意图，在讯息歪曲方面，信息的系列传递改变了其初始含义，在模棱两可方面，疏于选择容易理解的字眼可能导致接收者解释讯息的活动余地太大而偏离了说话人的要旨。这一定义也揭示了传者惯于命令式或者教训式地，而藐视、践踏下行传播的态度。

误传的机器或者管道定义至少在两个方面

是有问题的。首先,讯息的接收者被看作是相当被动的,而且在意义的建构方面扮演着毫不重要的角色;而现在,“被动的阅听人”理论已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其次,这一定义假定讯息传递者总是打算清晰地传送,实际上也并不总是这样,因为模棱两可有时候反而会促进有效的传播。

著名的“交往协作规则”曾要求“避免模棱两可”及“不要说你相信是错误的话”等等,尽管这些规则的存在的确减少了许多人在大多数时间里打破这些规则的事实,但是,尤其在复杂的组织中,传播者的语言能力要比把信息从A点简单地移送到B点所要求的多得多。模棱两可往往可以被组织成员策略性地使用来完成一些重要的目标,例如:促进多样性的一致;保持特权地位;可以否认;使组织易于变迁,等等。

一致化的多样性的一个例子可以在组织的任务陈述中找到,如果讲得太清楚,反而可能引起分裂、不和,像一些政治纲领中,许多任务必须足够的抽象。模棱两可维持特权地位的功能,是指一个传者如雇主,若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或受人尊敬,他就可以在陈述显而易见的观点时含糊其辞,让别人因相信他过去的成绩而想当然地补充完整。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当一个群体发展了自己的行话或隐语时,那些在外人看来是“无效的”词汇,却可以使群体内部的传播更有秩序更有效率。可否认性对于像雇主那一类的传者也是特别重要的,雇主们因而能够很容易地左右逢源。最后,模棱两可往往使组织的变迁更为容易,因为团体和个人能够获得改变集中行动的足够的自由而适应变迁的需要。

模棱两可的策略性使用说明了传播不只是理性的,即试图使理解最大化,而且还包括了其他个人因素。因而,理性的信息工程模式应该被更广泛的礼貌、圆滑、无恶意的谎言等诸如此类的信息控制观点所代替。这种朝着考虑个人动机的方向的转换把我们导入了实用主义观点。

实用主义的看法:误传视作目标完成失败

这一视角把有效性等同于目标完成,它的最大的问题却来自道德相对主义。譬如一个组织的首脑可以策略性的模棱两可来逃避对其领导不力的指责,而有效性的判断往往不会与他或她的语言中缺少明晰性扯在一起,而是将与这位首脑

能否逃避责备联系在一起。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称职的传播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采用并说出合适的东西。不合适意味着策略选择的目标完成之间的欠配合,意味着误传,但是其道德含义却在于究竟对谁不合适?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诸如雇员对受雇经历撒谎及雇主对工作条件安全性的信息有所隐瞒,却都会使传播更有效的例子,其中都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

实用主义视角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决定适当的时机来作有效的传播。假定某个目标是要“改变受者的基本信念”,这个转变的发生需要多久呢?一个批评性的观点,事实上可能首先引起的是一个防卫性的反应,也许要到几个月后才能显示出有什么进步。

此外,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具体的传播往往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压倒一切的目标,有效性总是意味着多个目标之间的平衡。但是尽管这一认识使得实用主义者能够更好地接近传播的现实,它还是无法使我们从任何目标取向的传播的固有的道德困境中解脱出来。

人际关系:误传视作开放失败

一些学者在探讨组织传播这类小众化的传播效果时集中于开放性和自我表露的重要性,他们建议更进一步的坦率与传播的有效性是有同等价值的。在组织中,开放性应当被看作是建立一个有效工作团体的基础。反对者则批评这种“开放意识形态”,他们保证人们既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与他们的同事之间保持彻底的开放。相反,在许多组织中,人们从封闭中而不是从开放传播中获得报偿。

尽管人们可以断言开放传播可以使工作关系的建立和更好决定的作出来得更顺利,但是还没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或许开放性的意图是好的,然而现实的传播情境提供的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窘境。进一步地,最有趣的对传播的挑战是决定泄露(或隐瞒)多少,怎样、什么时候及向谁泄露。

组织参与者和理论家们不加批评地为开放传播作保证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社会关系的分享比喻方面的不精确的信念。分享比喻暗示了有效传播要求互动者之间认知与情绪的分享,而且这种倾向在关于强势文化——被同质的理解、信念

和价值观打上标记的态度磐石——的发展的争论中也有所体现。对分享和一致性的追求反映了一种霸道的解决分歧而不是学会与它共处的欲望。但是,对一个有效的组织来说,分享不是必需的,行动的协调常常比信仰的协调更重要。更进一步地说,意见分享的缺乏还可以提供一个支持多样性的气氛,组织成员们如果彼此了解得更好反而会互相妨碍。

正如简单地认为“明晰”是有帮助的一样,“开放”也是如此。某种程度的开放可能对一个目标是适当的,对其他目标则不然。因此仅仅由于不够开放、公开、诚实就认为是“误传”是不适当的,在作出这种判断之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东西。

批判视角:误传视作对话失败

传播内容曾长期被看作是“罐装的独白”,是从一个说话人口里“全烹式”地出现的,劝服也被看作是传者向受者的单向灌输,这种对受者可能扮演的拒绝、修饰或者协作方面的主动的角色的忽视在“施动者”(agent)和“靶子”这样的字眼的使用中得到证实。传播的独白的观点深深地植根于意义的个人至上论模式,即把个人具体化为在头脑中“拥有”意义的主体,因此它与前面讨论的管道比喻是一致的。然而真实的传播则常常相反,传播内容是在对话中共同建构的,无论有声或者无声,受者都可以是一个积极的对话者。

对话视角比其他观点都更为民主,而且还是行动取向的。这种行动取向即对实践和行动关切,一方面也许有着苏维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另一方面它与批判理论是很相似的。批判学派把组织看作是阻止参与者发挥全部潜能的支配系统,从这个角度看,组织的有效传播是能够产生个人解放的开放式对话,而误传则是压制个人而支持组织的任何传播。

不幸的是在采用对话式或批判视角时,道德相对主义也没有被解决,而只是被避开了。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谁包括在对话中?因为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和被剥夺权利是一样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误传不仅当对话失败时发生,而且当某个利益团体被排除在对话之外时也可能发生。

一个可替代的定义:误传视作平衡失败

如果把传播的目的性称为组织化,那么前述的小众化的组织传播也可以扩展到大众传播。事实上传播总是在扮演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传播是约束的一种表达,促进组织化的责任、行动和任务完成;另一方面,传播表达了创造性,通过互动,个人能够锻炼自主性及展示创新能力。组织化行动和个人性施动在所有社会结构中都存在的,个人努力保留足够的独立来获得成长和福利;而同时,也进行必要的协作并感受到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个人性施动和组织化约束之间的微妙平衡因此而在传播中“上演”,每时每刻,在每一个组织过程中的成员选择泄露或者隐瞒,表达或者抗议,这样就形成了某种动态的平衡。有效传播就意味着自主和控制之间的适当的平衡,而误传则是平衡的失败:太自由了,组织化变得机能不良;太少的自由,则个人遭殃,组织化迟钝并停滞不前。

尽管我们觉得这一定义更适合组织化生活的现实,但是我们也无法逃避道德相对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地,缺陷还在于那些可以算作自主和控制之间的“适当”的平衡的东西总是因行为、因时间和因文化而异的。比如就企业行为而言,更多的自主可能受到工会的欢迎,而这正是股东所担心的;在一个企业的发展阶段构造严格的管理系统和责任制度是不成熟的,正像在“成熟”阶段高水平的自律和低程度的控制是不适当的一样;再如日本和韩国的主管很少直接说“不”,而在那在和西方文化打交道时则会出现显著的迷惑不解,等等。

总之,误传的定义无法充分地逃避相对主义和情境依赖。N. J. McGuire(1983)的文本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对误传加以思考的有点与众不同的方法,那就是:没有什么理论或假设总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而且,我们应该像所有的理论在某处必定是正确的那样去做,这样,研究的目的就是去发现不同理论所应用的文本。回到现在的讨论中,则可以说没有什么误传的精确的定义,而只有一个特定类型的传播更多或者更少有问题文本的不断发现。(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